

综合竞争合作优势：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持久不衰的理论解释^{*}

裴长洪 刘 斌 杨志远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抓住了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制造业生产环节国际转移的历史机遇，奠定了中国工业品制造大国和贸易大国的地位。即使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国际贸易争端与逆全球化浪潮等“黑天鹅”事件，中国产品依然保持强劲“韧性”，并没有陷入所谓的“比较优势陷阱”。西方主流国际贸易理论对此难以做出解释，亟须我们对西方理论进行反思，并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武器，从纷繁复杂的中国故事中，抽离出具有高度概括性的逻辑主线和基本规律。这就是：劳动要素、开放合作、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大规模市场、技术创新五种优势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演进中梯度递进、逐级叠加、螺旋上升，由此形成的综合竞争合作优势是中国产品国际竞争力持久不衰的根本动因。在时间和空间上高度匹配并与差异化市场化改革高度契合，形成培育中国综合竞争合作优势的内在动力和体制保障。这就是来自中国实践的理论解释，而不是用中国案例诠释西方理论、证明西方理论正确的书斋教条。

关键词：综合竞争合作优势 国际竞争力 制度性开放 全球经济治理 马克思主义开放经济理论

作者简介：裴长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经济研究所研究员，100836；

刘 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00029；

杨志远（通讯作者），安徽财经大学副教授，233030。

中图分类号：F74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21)05-0014-17

上世纪 90 年代，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国际垄断资本在扩张全球市场中进行了新的生产重构和布局，特别是以交通运输设备（主要是汽车）、电子及通讯设备（主要是笔记本电脑和手机）为代表的新产品成为跨国公司全球布局产业链的主要产业。在此过程中，基本形成了以美国、日本、欧盟控制三大产业核心技术和主要零部件生产，以新兴市场经济体生产一般零部件或进行组装为特点的垂直型国际分工网络，这种全球性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体系也被学术界称作全球价值链。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抓住了这一战略机遇，不断嵌入经济全球化体系，从 1994 年开始扭转了货物贸易长期逆差的历史，进入顺差阶段。随着中国工业化的升级和外商投资结构的变化，以及技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三重叠加冲击下全球价值链重整与中国国内生产链构建融合发展研究”（20BJL115）。杨志远电子邮箱：mavrickbg@hotmail.com。

术外溢和生产的前后向关联的发展,中国本土企业的投资和产品供给能力不断增强,特别是产品分工的细化,不仅给予本土企业发展的广阔空间,而且使中国制造获得了持久不衰的国际竞争力。

怎样解释中国发生的故事?长期以来,我们只会用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来解释,特别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但该理论并未得到西方理论界的完全认同,甚至被批判为“比较利益陷阱”,^①而中国的事实也不支持“比较利益陷阱”的判断,那么,应该用什么逻辑来解释中国的故事呢?这就是本文试图要回答的问题。

一、对西方主流贸易理论的哲学反思

怎样分析和评价人们长期顶礼膜拜的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在当今中国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科学领域,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一分为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得到与中国实践相符合的认识和结论,否则,只能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毛泽东说:“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②习近平(2019)说:“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实践决定认识,是认识的源泉和动力,也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正确的认识推动正确的实践,错误的认识导致错误的实践。”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是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世界观,又是方法论。首先,运用一切从最基本的经济事实出发分析问题的唯物论方法。一切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是唯物论的最基本的分析方法。其次,运用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综合分析方法。人的认识总是从一个一个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事物开始,但又不能停留在具体的、表面的现象上,而是运用从具体到抽象又从抽象到具体的分析方法,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马克思从商品这个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最常见的现象入手,抽象出一系列科学概括事物本质的概念和范畴,再运用这些概念和范畴综合分析,从而揭示出资本主义的全部秘密。其三,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分析方法。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间的根本规律,马克思运用对立统一观点观察资本主义社会,采取矛盾分析方法,从劳动二重性的内在矛盾分析入手,揭示了私有制条件下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从而揭示出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反思和检讨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是我们今天必要的补课任务。西方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从亚当·斯密开始,他的“绝对优势理论”主要解释了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尚未占据统治地位时期,以互通有无为特征的国际贸易现象,其历史意义在于把生产领域引入了经济学,并强调了分工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但其局限性是明显的,因为世界上恰好有两个国家具有不同商品生产绝对优势的情况极为少见,这种假设的实践依据很勉强,而且亚当·斯密还错误地认为分工是交换引起的,这个认识显然是对实践情况的本末倒置,因此他的理论在古典经济学中的生命力和影响力都非常有限。

^① “比较利益陷阱”是指一国完全按照比较优势生产并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则在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经济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中,虽能获得利益,但贸易结构不稳定,总是处在不利地位,从而落入“比较利益陷阱”。参见[美]安妮·克鲁格《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就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页。

1815年,英国政府为维护土地贵族阶级利益而修订实行了“谷物法”,之后粮价上涨,地租猛增,工人工资上涨,严重损害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工业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找到谷物自由贸易的理论依据,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应运而生,它从劳动生产率差异的角度解释了国际分工和贸易发生的原因,为自由贸易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成为自由贸易旗帜的一个理论标签,在这个意义上说,它具有进步性,也在古典经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比较优势理论”长期被中外经济学界所信奉,但这种信奉,更大程度上是它的时代标签意义,而不完全是学术意义。对它的评价也有非议,在西方经济学中,对它的质疑不仅有“比较利益陷阱”一说,连现代西方经济学大家萨缪尔森也提出质疑,认为其逻辑结果只能导致一方受益,而另一方受损(Samuelson, 1948, 2004)。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也认为,其错误在于他的理论抽象只有世界(世界主义)和个人(个人主义),而没有国家。用我们的话说,就是没有实践依据。但李斯特的批判是基于其贸易保护主义主张,因为贸易保护需要国家。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来考察,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存在三方面的缺陷,因此它只是一个假说,而不具有科学理论的依据。首先,在基本方法论上,它提出的“两个国家、两种产品”交换的抽象概念就没有任何实践依据,世界上的国际贸易现象纷繁复杂,哪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是建立在这种只有“两个国家、两种产品”交换的假定之上?因此这种国际交换的理论模型不具有实践考察的基础,只是一种主观主义的想象,是唯心主义哲学观的产物。它与马克思《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商品这一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事物的科学抽象不同,也与另两位古典经济学贸易理论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的“要素禀赋优势理论”不同,后二者都具有实践观察的基础和实践的可检验性,因此是科学意义的抽象。其次,在经济学逻辑分析上,李嘉图的国际交换假设难以用马克思的价值规律理论说得通。按照他的假设,一个落后国和另一个先进国都生产两种产品: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落后国在两种产品生产中的劳动生产率都低于先进国,但落后国生产工具的劳动生产率更低于生活资料生产,因此落后国选择生活资料作为专业分工生产,从而获得专业分工效率和交换利益。乍一看似乎很有道理,但是,按照马克思的价值规律理论,交换价格是由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落后国在两种产品生产中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都多,因此交换价格较高,当它通过国际交换引入先进国的生产工具产品时,获得了价格上较便宜的生产工具,但是当它要出口价格高的生活资料产品给先进国时,先进国能够放弃较便宜的本国产品而扬短弃长吗?马克思分析过国际贸易的功能是:“对外贸易一方面使不变资本的要素变得便宜,一方面使可变资本转变成的必要生活资料变得便宜,就这一点说,它具有提高利润率的作用,因为它使剩余价值率提高,使不变资本价值降低。”^①因此在逻辑演绎结果上,就产生了第三个缺陷,李嘉图所谓的自由贸易理论实际上是宗主国与殖民地的不平等交换理论。在他的两个国家、两种产品的假设中,主导国际贸易的先进国决不可能允许落后国用本国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格向先进国出售生活资料产品,而只能用等于甚至低于先进国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格来出售产品。因此,由此鼓吹的“自由贸易”,实际上是不平等贸易。在现实世界中,南北之间的国际贸易一直是一种不平等贸易。发达国家以高于本国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格向发展中国家出售工业产品,而以低于本国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格向发展中国家购买原材料和初级产品。这种“比较优势理论”实际上是为不公平的全球生产分工体系和贸易秩序进行辩护的工具。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64页。

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的“要素禀赋优势理论”^①在某种意义上拯救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确实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现象和事实,在劳动生产率相同的情况下,要素禀赋因素确实对产品成本的多少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在人力资本和科学技术尚未深入参与生产过程的情况下,要素禀赋的影响程度更大。古典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将要素禀赋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糅合在一起,甚至干脆把要素禀赋理论演绎成比较优势理论,因为无论从语义还是逻辑上,两者的糅合更符合人们的顺势思维,久而久之,非专业研究者事实上早已忘记李嘉图“两个国家、两个产品”假设的原意。当它传入中国并在非专业研究者中广泛流传之后,更是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我们的民众、媒体甚至政策语言中,使用频率很高的“比较优势”,已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完全不同,尤其是政策语言中的“比较优势”,实际上是一种思想启发和动员,包括发现“绝对优势”(你无我有)、要素禀赋优势(你少我多),还包括创造竞争优势(你有我优、你优我廉)。所以,今天中国社会中广泛使用的“比较优势”,已经是一种演绎和发挥,其内容已经被改造,已经成为“中国创造”,这绝对是李嘉图始料未及的。因此,经济学研究要分清这二者的区别,就像分清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一样。

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市场中统治地位的确立,国际贸易新现象异彩纷呈,新古典经济学走上历史舞台,创立了不少贸易理论。其中,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分析了技术转移过程中产品随其生命周期发生竞争力优势的变迁(Vernon, 1966);克鲁格曼的“垄断竞争优势理论”强调了规模经济对于竞争力的作用,又从规模经济中引申出跨国公司的贸易理论,出现了公司内贸易、技术内部化、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与贸易等细分理论,且强调跨国企业组织结构对于竞争力的影响(Krugman等, 2015)。从跨国公司贸易理论中再引申出中间品贸易理论和全球价值链理论,强调融入全球化的供应链对国际竞争力的作用,这个理论使新古典贸易理论在上世纪90年代达到最高顶点(Gereffi和Korzeniewicz, 1994)。美国经济学家波特提出的“国家竞争优势四因素”理论(Porter, 1990),在相当程度上拓展了新古典贸易理论的视野,带有一定的综合性。此后的“新新贸易理论”(Melitz, 2003)回归微观领域,强调企业生产率差异对于贸易的影响,但该理论关于“异质性企业”的解释范围很有限,在西方贸易理论中也没有太大影响力。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只了解过去一方,不了解将来一方,只了解个体一方,不了解总体一方,一句话,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这就叫做片面地看问题,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② 尽管新古典贸易理论对于国际贸易竞争力的解释具有某种程度的实践观察意义和实证上的可检验性,均具有不同程度的合理成分,但它们都存在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只强调事物的某一方面,且静态地看问题。在哲学上它们是机械唯物论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在经济学逻辑分析中缺乏历史观与实践观的统一性。例如,在产品不同生命周期的技术转移过程中,实际上离不开要素禀赋的选择;规模经济优势离不开资本要素的集聚;跨国公司的组织结构和区位分布离不开不同地理区位的要素禀赋和其他条件;经济全球化中价值链供应链的形成更离不开各个经济体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影响;“国家竞争优势四因素”理论,则明显是静态分析,缺乏历史动态性的考察;即便是“异质性企业理论”,影响企业生产率的因素也绝不仅仅只有技术因素。因此它们的基本失误,主要表现在忽视了综合性

① 该理论认为,各国会出口具有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商品,进口要素禀赋稀缺的商品。已成为比较优势来源的一种新解释。

② 《毛泽东著作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95页。

和历史过程的“优势叠加”，忽视了对实践过程中具有典型特征的考察和对其他贸易理论的吸收与综合。总结中国故事的逻辑，应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指导，避免西方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谬误，这是我们进行理论创新的唯一出路。

二、优势叠加：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形成与发展

按照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的顺序，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优势叠加过程是：要素禀赋优势、开放合作优势、基础设施和产业集聚优势、大规模市场优势、技术创新潜力，这也是综合竞争合作优势的形成过程（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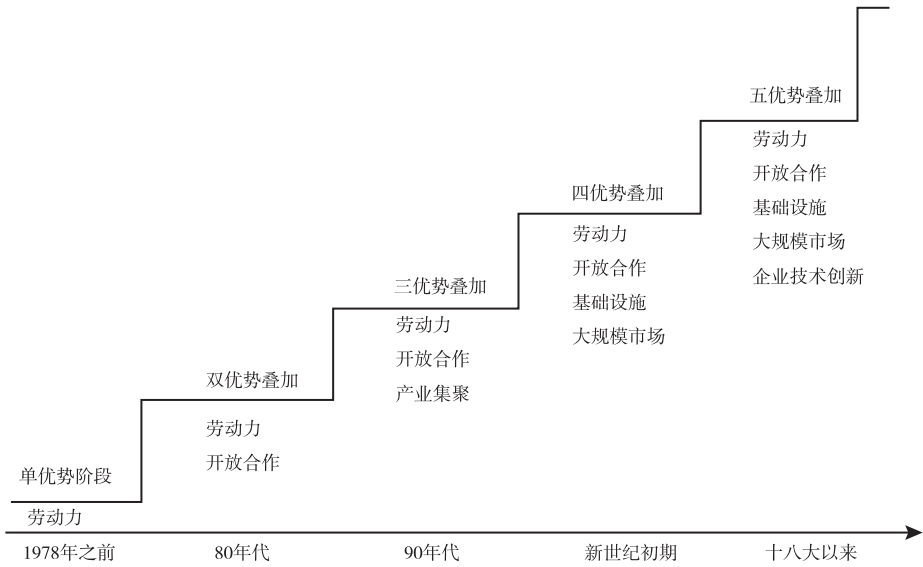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的五阶段演进

（一）单一要素禀赋优势阶段（劳动力要素禀赋）

改革开放前，中国贸易体制的主要特征是计划管理和国家统一经营，对外贸易功能局限于互通有无，调剂余缺，各个产品进出口额都非常少。从结构上看，凭借极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主要出口农产品和手工艺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初级产品出口占比超过 50%（见表 1）。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基本是隔离的，劳动力过剩问题非常突出，要素禀赋优势无法得到充分体现。

表 1 1957—1980 年部分年份中国出口产品结构 单位：亿美元、%

| 年份 | 出口总额 | 初级产品 | |
|------|-------|-------|------|
| | | 金额 | 比重 |
| 1957 | 10.22 | 8.11 | 79.4 |
| 1970 | 22.6 | 12.1 | 53.5 |
| 1975 | 72.64 | 40.98 | 56.4 |
| 1980 | 181.2 | 91.1 | 50.3 |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二)双优势叠加阶段(要素禀赋、开放合作)

改革开放破除了长期困扰人们的思想藩篱,释放了要素互通与经济增长的活力。加工贸易是了解中国过去40多年对外贸易奇迹的关键起步,其模式是对国外进口的原材料实行海关特殊监管,利用本国廉价劳动力,加工成成品后,销往国外市场。“来料、来件、来样加工装配”和“进料加工”这两种贸易方式是中国产品打开国际市场的先手棋,曾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占据“半壁江山”,“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由改革开放初期的6%直线上升到1993年的41.2%(见表2)。这一时期,制成品原料、中间品进口速度处于上升阶段,但由于竞争力较低,中间品出口并不占主导地位。

表2 1981—1993年部分年份中国加工贸易情况 单位:亿美元、%

| 年份 | 加工贸易 | 贸易总额 | 比重 |
|------|--------|--------|-------|
| 1981 | 26.35 | 440.2 | 5.99 |
| 1983 | 42.16 | 436.2 | 9.67 |
| 1985 | 75.9 | 696 | 10.91 |
| 1987 | 191.85 | 826.5 | 23.21 |
| 1989 | 369.49 | 1116.8 | 33.08 |
| 1991 | 574.6 | 1357 | 42.34 |
| 1993 | 806.2 | 1957.1 | 41.19 |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在某种程度上,加工贸易的发展是要素禀赋与开放合作优势叠加的集中体现,在这其中,农村改革和对外开放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若当时没有农村改革,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若没有对外开放,通过外商引进原材料和生产线,并利用国外市场,中国劳动力要素禀赋优势就无从发挥。当然,这种优势的体现也与当时国际市场分工重构密切相关,双优势叠加与全球产业大转移开启了中国贸易增长的原动力。

这里需要指出,中国利用外商投资和扩大对外贸易的收益不可能用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来解释,只能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来解释。首先,利用外商投资扩大了资本品进口,正如马克思所说,它使不变资本变得便宜了。而且我国在鼓励外商投资政策中还规定,除了一部分限制类的外商投资,多数外商投资企业进口的自用设备、原材料都给予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增值税的优惠,这等于给予大多数资本品“自由贸易”的待遇。其次,虽然我国劳动力在外资企业中工作的报酬不可能按照世界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形成的价格来支付,甚至低于贸易对象国同类产品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但是,在外资企业工作的绝大多数劳动力都来自农村,其工业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农业部门,其个人所获报酬也高于农业部门,因此即便他们受到外资老板的“剥削”,收入仍然是增加的。大量劳动力进入工业生产部门所形成的国民收入,拉动了国内市场和国内经济循环,形成了国民经济的宏观收益。这是广大农民工踊跃进入外资工厂,各级地方政府热情招商引资的动因。再次,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收入提高,资本家不可能始终依靠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来获利,而要通过提高技术装备水平来获取相对剩余价值。外资企业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不仅有利于保障工人劳动力价格的实现,而且形成了技术外溢和产业链的前后向联系,促进了东道国产业的进步和升级。中国加工贸易中“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两种贸易方式的消长变化就是一个最

典型的例证。加工贸易是中国政府为了吸引外商投资、扩大出口而采取的一种海关特殊监管措施,分为“来料加工装配”和“进料加工”两种贸易方式。前者的投资者在中国境内设立简单的生产线,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仅仅加工全部来自境外的、被海关特殊监管并保税的原料和半成品,加工后出口境外,工人所获得报酬的名称是“工缴费”,这是典型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后一种贸易方式的投资者需要在中国境内注册登记,成为企业法人,所引进的设备也比前者先进,企业法人受到中国政府各种法律法规的约束,对工人比较有利;企业只部分进口被海关特殊监管并保税的原料和半成品,其余部分由境内供应商配套,有利于带动境内产业链发展。显然,这种贸易方式接近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我国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开始在沿海地区吸引的外商投资多数都采用“来料加工装配”贸易方式,但随着经济发展,“进料加工”贸易方式逐渐取代前者,到 1989 年在整个加工贸易中已占 53.1%,^①90 年代后期,“来料加工装配”贸易方式日趋式微,到 21 世纪已经可以忽略不计。

(三)三优势叠加阶段(要素禀赋、开放合作、工业化和产业集聚)

随着对外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中国对外贸易方式也在发生转变。入世后,中国开始全面融入全球价值链,且地位逐步攀升,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中间品出口大量增加,进口亦未减速,“大进大出”是这一阶段的典型特点(见图 2)。说明中国本土工业产品的供给能力增强,开始逐步摆脱对进口原材料、中间品的严重依赖。在这一时期,我们可以观察到两个典型事实,一是中国工业化迅速普及,特别是乡镇工业大量发展,其中一些直接成为进出口贸易的重要微观主体;二是中国产业集聚效应开始显现。

首先,城市工业大量向农村扩展,乡镇工业的发展速度超过城市工业,促进了中国工业化的普及。工业投资逐步成为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部分,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进入快速通道,其中乡镇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上升很快(见表 3)。随着中国工业产品供给能力的增强,为进出口贸易配套的中间品贸易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期达到拐点。

表 3 1990—2001 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乡镇工业发展情况 单位:亿元、%

| 年份 |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 工业增加值 | 乡镇工业增加值 | 乡镇工业增加值比重 |
|------|-----------|----------|------------|-----------|
| 1990 | 4517 | 6241 | 588 | 9.4 |
| 1991 | 5594.5 | 7703 | 687.6 | 8.9 |
| 1992 | 8080.1 | 9805 | 1044.1 | 10.6 |
| 1993 | 13072 | 12842.63 | 1965 | 15.3 |
| 1994 | 17042 | 14700 | 6380 | 43.4 |
| 1995 | 20019.3 | 24400 | 10804 | 44.3 |
| 1996 | 22974 | 29082.6 | 12627 | 43.4 |
| 1997 | 24941.1 | 31752.3 | 15036.5328 | 47.4 |
| 1998 | 28406.2 | 33541 | 15530.2725 | 46.3 |
| 1999 | 29854.7 | 21564.74 | 17374.1098 | 80.6 |
| 2000 | 32917.7 | 25394.8 | 18812.4115 | 74.1 |
| 2001 | 37213.5 | 28329.37 | 20314.6621 | 71.7 |

资料来源:《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农业统计资料》。1990—1993 年没有乡镇工业增加值数据,用利润额代替。

^① 裴长洪:《中国开放型经济建设 40 年》(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53 页。

其次,产业集聚优势开始显现。产业园区是产业集聚的重要载体,中国的产业园区经历了初始发展阶段(1984—1991年)后,进入21世纪的高速发展阶段(2000—2009年),呈现“井喷式”增长。从园区类型来看,中国产业园区经历了出口加工区、经济产业园区、高科技产业园区、产业聚集功能区(如物流园区、软件园区等)到保税区、综合保税区、临空经济区、临港经济区、陆港经济区、自贸区等各种形态的演变和升级(贺沛,2020)。截至2021年1月,中国共有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219家。产业园区独有的配套优势、规模经济和营商环境促进了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形成。

(四)四优势叠加阶段(要素禀赋、开放合作、基础设施和产业集聚、大规模市场)

首先,基础设施存量迅猛增加,“基建狂魔”让世人惊叹。2001—2008年,中国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年均增长率高达17%,2010年跃升为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世界排名第一。短短十多年间,中国基础设施如此超常规发展,在世界基础设施建设史上实属罕见,堪称中国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背后的“奇迹”。中国基础设施的增长与前三阶段的开放成就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中国从1994年结束了货物贸易逆差的历史,并在新世纪初进入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阶段,外汇储备迅速增长,2007年达到3万亿美元以上。中国中央银行通过外汇占款形式增发20多万亿元人民币,成为新增人民币流动性的主要渠道,并为中国的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资产的货币化提供了重要条件,而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资产的货币化又极大地带动了整个中国整个房地产及基础设施建设。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逐渐形成了基础设施促进贸易发展的外部条件(见表4)。

表4 2000—2010年中国外汇储备、货币发行与基本建设投资情况 单位:亿美元、%

| 年份 | 经常账户 | 资本和金融账户 | 外汇储备资产交易变动 | 人民币广义货币增长速度 | 固定资产投资建设总规模(亿元) | 基本建设投资增长速度 |
|------|------|---------|------------|-------------|-----------------|------------|
| 2000 | 205 | 19 | 109 | 12.6 | 91641.68 | 7.8 |
| 2001 | 174 | 348 | 466 | 15.4 | 106854.61 | 10.4 |
| 2002 | 354 | 323 | 742 | 19.9 | 122413.69 | 19.2 |
| 2003 | 459 | 527 | 1168 | 19.6 | 147038.73 | 29.7 |
| 2004 | 687 | 1107 | 2067 | 14.4 | 192739.3 | 23.1 |
| 2005 | 1608 | 630 | 2089 | 18.0 | 247510.31 | 22.3 |
| 2006 | 2499 | 100 | 2475 | 16.7 | 299682.14 | 19.1 |
| 2007 | 3718 | 735 | 4619 | 16.7 | 366270.26 | 14.7 |
| 2008 | 4261 | 190 | 4178 | 17.8 | 462788.03 | 22.0 |
| 2009 | 2841 | 1091 | 4531 | 28.4 | 600131.62 | 41.2 |
| 2010 | 3054 | 2260 | 4482 | 18.9 | 769426.7 | 18.0 |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

其次,国内大规模市场开始形成。2012年党的十八大之后,随着扩大内需、新型城镇化等政策的推进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中国大规模市场逐步形成。尽管这一时期中国整体GDP增速有所放缓,但消费市场规模仍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并呈现出四个特点:一是城镇和乡村的消费同步增长;二是中西部地区消费增速较快;三是通讯器材、家具、建材消费增速较快;四是网络购物、刷卡消费等快速增长。大规模市场的形成也在深刻改变着中国对外贸易结构,使对外贸易呈

现出三个基本特点。一是超大规模市场所引致的国内市场效应进一步提升了出口产品结构和竞争力,尽管这一时期遭遇了全球化逆潮,但中间品出口仍然保持稳定,这与其他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二是随着国内产品技术和质量的不断提升,进口替代效应开始显现,中间品进口迅速下降。三是由于国内消费需求不断增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品和初级产品进口开始明显增加(见图3),2012年石油净进口量达2.93亿吨,比上年增长7.9%;包括液化石油气和管道天然气在内的天然气总进口370亿立方米,增长近三成,约占当年总消费量的25.1%;而大豆进口5838万吨,同比增长11.2%。^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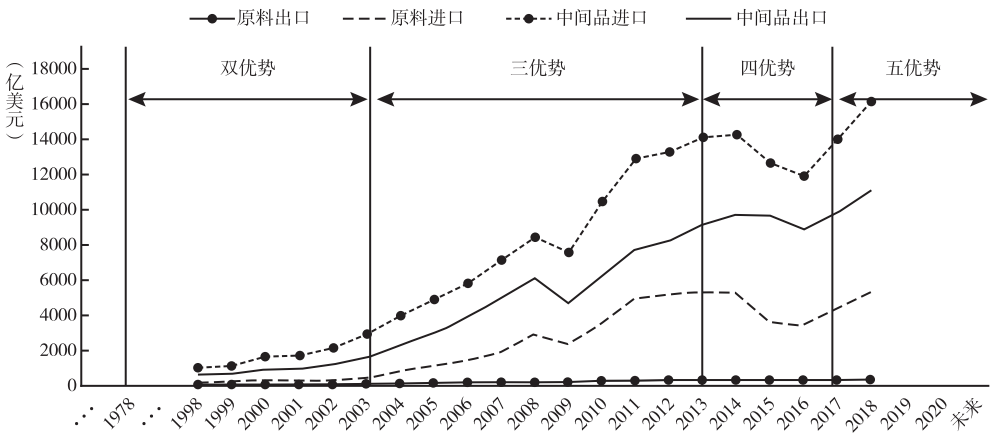


图2 原材料与中间品进出口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UN Comtrade Databa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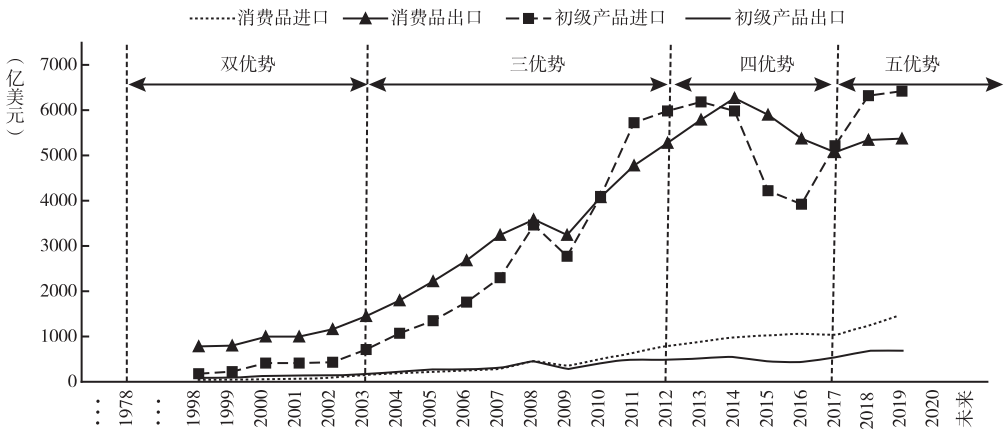


图3 初级产品与消费品进出口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UN Comtrade Database。

(五)五优势叠加阶段(要素禀赋、开放合作、基础设施和产业集聚、大规模市场、技术创新)
党的十九大以来,随着国家创新战略的推进和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中国国际贸易新动

① 数据来源于 UN Comtrade Database。

能正在形成,中间品出口保持稳定增长态势,进口亦开始反弹,由于国内市场效应不断累积,对原材料、初级产品和消费品的进口需求明显增加(见图3)。新时期技术创新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企业主体创新能力提升,“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演变,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在全球131个经济体的创新能力排名中,中国上升至第14位。2019年,中国R&D人员全时当量达480.1万人,保持全球第一。这一时期,劳动力要素禀赋优势开始由人口数量“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过渡。二是互联网技术引致贸易模式创新,跨境电商已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新业态。中国跨境电商市场规模已超10万亿元,占当年中国进出口总值31.54万亿元的33.29%;通过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进出口1862.1亿元,同比增长38.3%,2016—2019年四年平均增速超过50%。^①

正是五阶段优势的累积,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得到稳步提升,国际贸易韧性持续增强,这一优势在2020年表现得尤为明显,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和异常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进出口、出口规模均创历史新高,进出口总值32.16万亿元,同比增长1.9%。其中,出口17.93万亿元,增长4%,成为全球唯一实现货物贸易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国际市场份额大幅跃升,达到创纪录的13%,中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②

三、市场化改革是中国综合竞争优势的内在动力和体制保障

上述任一优势的发挥和叠加过程,都与中国市场化改革、对外开放进程相伴随,中国综合竞争优势的形成与发展是中国经济社会体制变迁的结果。对中国综合竞争优势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与政策变量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外贸体制改革:从“放权”到“接轨”

中国贸易体制改革经历了由计划管理走向市场支配的过程,其改革路径区别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所建议的方式。国际上一般认为,第一步应将非关税手段关税化,第二步再将关税水平降低。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环境与一般发展中国家存在根本区别,国际上讨论对外贸易体制改革主要是指贸易自由化过程,即由保护型对外贸易体制向自由贸易体制转变,其体制基础是市场经济,改革的是政府干预对外贸易的方式与力度。中国的外贸体制改革虽然也存在贸易自由化的转变过程,但中国原先保护贸易体制的基础是计划经济,贸易自由化过程必须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过程中完成。因此,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就不是一个单纯的贸易自由化问题,而必须顺应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次序和步骤。基于上述原因,中国外贸在向市场化转轨过程中,首先逐步放松贸易管制,随着国内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进一步减少贸易数量的控制,其目标是通过体制改革释放潜在动能,扩大出口贸易,通过贸易保护,发展新兴产业与特定产业,促进经济发展。

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看,一是国内对外贸易法的制度性变迁,二是入世前后的“倒逼式”改革。这两个维度并不是割裂的,而是相互促进的。首先,《对外贸易法》及其后来的修订在很大程度上释放了劳动力要素禀赋优势,每次对外贸易法的修订都是中国对外贸易起飞的“助推器”(见图4)。1994年实施的《对外贸易法》是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对外贸易基本法,由于初次接触国际市场,仅赋予具有条件的国有企业、物资企业和科研单位以外贸

① 数据来源:艾媒数据中心, <https://data.iimedia.cn/>。

②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经营权,限于当时外贸活动管理的现实需要,对贸易经营者的主体资格限制具有一定意义。外贸经营权是外贸制度性开放的“晴雨表”,随着对外贸易交往的扩大,对经营主体的限制日益成为对外贸易发展的“掣肘”,2004年修订后的《对外贸易法》规定从事贸易经营活动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均可以从事对外贸易活动,真正实现了外贸主体从国家到地方再到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演进。2016年依据新情况又对《对外贸易法》做了修订,进一步减少了行政审批,完善了外贸促进措施,并且依据国际贸易新变化,新增了知识产权条款、对外贸易调查和贸易救济措施,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保护了企业创新,有利于企业转型升级。其次是入世谈判过程中和入世后的“衔接性”制度改进。从1986年开始,中国入世之路经历15年,入世谈判的过程,也是中国外贸体制改革不断加速的过程。为了与WTO规范相衔接,国家进一步减少进口计划的控制范围,削减直至取消行政性进口审批制度,完善许可证制度。2001年入世后,中国继续与国际经贸规则深度接轨,2018年平均关税降至7.5%,非关税壁垒大幅削减,营商环境进一步改善,既超额完成了加入世贸的承诺,也在最大程度上释放了对外贸易主体的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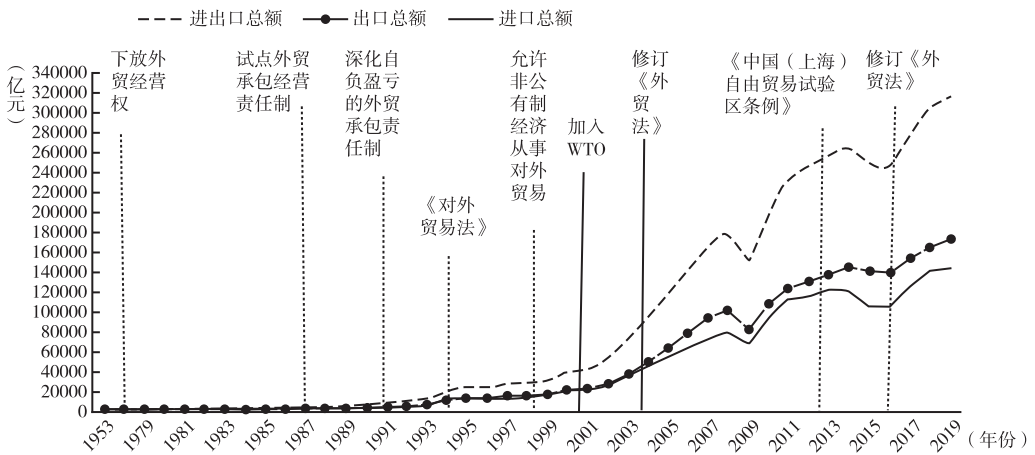


图4 外贸体制改革与中国进出口贸易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二) 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从“招商引资锦标赛”到促进投资便利化

中国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变革主要沿着政策制定和法律制定两条主线推进,政策演进主要是从经济特区优惠政策到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外商投资特别管理负面清单”,即从“正面清单”到“负面清单”的过程;法律演进主要是从“外资三法”到《外商投资法》的过程。

中国引资目标的政策导向一直比较明确,主要经历了从“弥补资金缺口”到“弥补技术缺口”,再到“与国际规则深度融合”三个阶段(见图5)。改革开放初期,国内经济增长的“资金缺口”较为突出,如何让更多外资进入中国以弥补资金缺口成为政策制定的重要考量。这一时期,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在空间布局上逐步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开发区”的开放格局,以GDP为核心目标的考核机制引发了各地方政府“招商引资锦标赛”,导致外资享受“超国民待遇”。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鼓舞了外商投资者信心,原本依赖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从事低端加工制造的经济功能区,凭借投资驱动实现了制造业转型升级。从“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起步,到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逐步实现价值链“小步”攀升,高新技术产业也在这个阶段开

始起步。随着中国自身投资能力的增强和外资大范围进入,国内资金缺口基本上得到填补,弥补技术缺口成为中国第二阶段招商引资的典型特征,“用市场换技术”是那个阶段的政策口号。在1995年颁布的第一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和《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中,外资项目被分为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四类,《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开始以“正面清单”(非允即禁)的形式引导外资有序进入中国市场。凭借要素、资金和技术的三重驱动,各种类型的产业集群开始形成。

2012年至今,中国进入了“新发展阶段”,在资金和技术缺口基本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如何实现与国际规则的“深度融合”成为中国引资政策的重要目标。相较于2015年版目录,2017年版目录纳入之前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推行的外商投资准入产业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开启了“负面清单时代”。2019年版目录继续将制造业作为鼓励外商投资的重点方向,支持外资更多投向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等领域。在此期间,中央政府分多批次批准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成为对外开放的“新高地”,促进了国内市场的进一步开放。

法律制度是评价营商环境好坏的重要参数,为解决外商进入中国市场可能遭遇的法律纠纷,从1979年到1988年,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以法律形式充分保障不同类型的外资企业。2001年中国入世后,进一步修订了“外资三法”,使之与WTO规则体系相适应,给予外资国民待遇、统一内外资立法、投资立法体系与国际接轨成为这次外资法改革的要点,实现内外资的“一视同仁”成为“外资三法”修订的最大亮点。随着国内形势变化,“外资三法”已不能满足新阶段的发展要求,为实现与国际规则的深度融合,实现投资便利化和优化营商环境成为法律新的着力点,2019年《外商投资法》应运而生,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在法律层面上首次得以明确,从而为招商引资提供更有力的法律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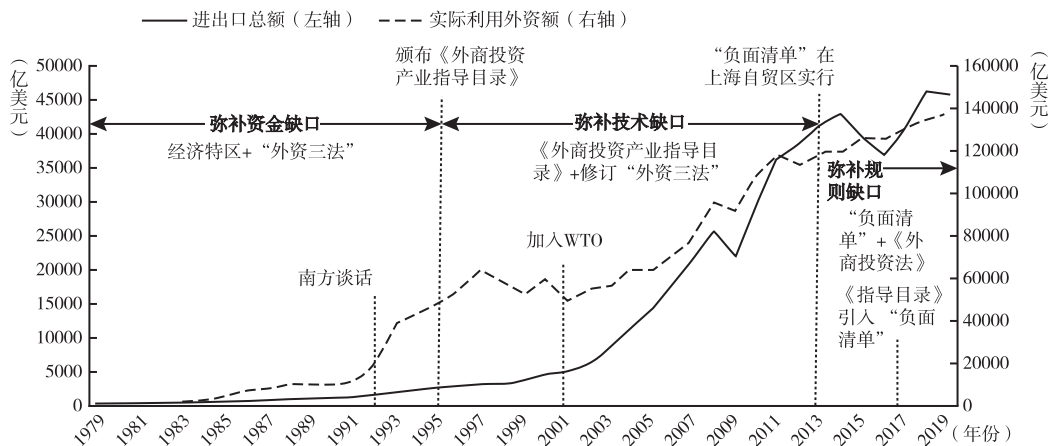


图5 1979—2020年中国的贸易和利用外资情况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进出口总额”使用的是《中国统计年鉴》的“货物进出口总额”指标。

(三) 汇率制度改革:从“计划管控”到“有管理的市场化”

汇率作为两种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对于国际贸易具有重要调节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汇率体制经历了多次重要调整,对中国外贸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汇率体制改革可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前实行的单一固定汇率制度。计划经济时期,进出口贸易和外汇管理都

受国家计划管控,对外贸易由国家财政统收统支、统负盈亏,汇率体制表现为国家决定的单一固定汇率制度,人民币完全不可兑换。这一时期,由于国民经济基础薄弱,国家以进口替代战略为主,通过进口来获得经济发展需要的机器设备进行扩大生产,因此国家在汇率管控上主要是压低汇率,以降低进口成本,对中国基础工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个阶段是引入汇率双轨制。改革开放初期面临着国际贸易逆差和外汇储备短缺的突出问题。因此,一方面,国家采取限制进口措施,指定国有外贸公司从事进出口贸易,以获得国内工业发展必需的机器设备和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国家鼓励企业出口创汇以解决外汇储备短缺,但汇率管理中存在的汇率高估使地方企业的出口业务受到亏损,打击了企业出口积极性。1979年,国家宣布实行官方汇率与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并存的双轨制。内部结算价是基于出口换汇成本来确定的,降低了汇率高估的程度,与同年实行的外汇留成制度一起调动了企业出口创汇的积极性,国际收支状况逐步得到改善。第三个阶段是形成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随着对外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以“三来一补”和“进料加工”为代表的加工贸易得到快速发展,国家外贸战略从进口替代转变为出口导向。与此不相适应的是,汇率双轨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官方汇率高估的问题,且外汇兑换比较困难,大大影响了外贸工作效率。1994年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同时建立全国统一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取消企业外汇留成制度,改行结售汇制度,实现经常项目下人民币的有条件兑换。一方面,汇改从根本上解决了此前存在的汇率高估问题,为企业带来更大成本优势,极大促进了出口和利用外资等外向型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汇改稳定了国家汇率水平,形成对人民币汇率的稳定预期,极大消除了进出口企业的不确定性,促进了对外贸易迅速增长。第四个阶段是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1年中国入世后,凭借劳动力等资源优势成为“世界工厂”,纺织、机电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规模快速增长,对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需求也大幅增长,表现出“大进大出”的外贸特征。同时,中国整体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出现巨额顺差,过高流动性给中国带来较大外部不平衡压力,人民币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200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单一盯住美元。同时引入做市商制度和询价交易机制,扩大市场调节的空间。伴随着国内贸易自由化进程,汇率体制体现出逐步放宽贸易限制、为贸易提供更多便利化的趋势,提升了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深度。第五个阶段是完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实行“再工业化”战略,并且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和环境成本的上升,国内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相继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全球价值链发生重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这就要求围绕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加快推进人民币市场化和国际化。2015年汇率改革的主要内容是透明化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市场化中间价报价机制,使中间价更能反映市场供求,促进形成境内外一致的人民币汇率。2017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模型引入逆周期因子,有效缓解了市场的顺周期行为,保证人民币的有序波动。人民币的升值和稳定有利于最终消费品的进口和技术进口,改变国家进出口贸易结构和促进国内产业链升级。2021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发布通知,要求进一步优化跨境人民币政策,发挥服务实体经济、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的作用,支持稳外贸、稳外资。

(四)出口退税、出口保险政策的制度化形成:从“促规模”到“调结构”

出口退税制度和出口信用保险制度作为国际贸易中的两个重要政策工具,不仅促进了中国对

外贸发展,也在引导产品转型升级。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为保护幼稚产业,中国实行对外贸易管制,当时的出口退税政策以弥补出口企业亏损为主,退税范围比较有限。改革开放后,贸易体制逐渐摆脱了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出口贸易增长使出口退税制度的必要性再次显现了出来。1985年出口退税制度正式恢复,所带来的税收效应增加了企业可支配收入,在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共同作用下,企业出口积极性大大增长。1994年税制改革后,对出口货物实行了“应退尽退”的中性原则,平均出口退税率达16.13%。在这一政策激励下,中国出口增长在1994年和1996年突飞猛进。从2005年开始,出口退税从“应退尽退”的中性原则逐渐调整为“差别退税”,出口退税制度演变成为政府调整出口和产业结构的政策工具。2007年为避免外贸顺差过大带来的贸易摩擦,对以服装、玩具和钢铁制品为代表的部分低附加值的商品调低了出口退税率。整体来看,国家财政的出口退税规模从1995年的550亿元上升至2001年的1080亿元,实现退税额翻番。入世后,退税规模进一步上升至2007年的5605亿元,经历全球危机调整后,在2012年登上万亿台阶,达到10429亿元。截至2018年,我国出口退税规模达到16914亿元,较1995年增长近30倍。^①

随着政策工具的不断优化,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大幅上升。第一,“差别退税”原则不仅减轻了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也释放了重要的政策信号,继而改善了我国出口商品的结构。在信号效应的驱使下,企业根据利益需求自发调整供给结构,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机电产品自1995年起取代纺织品成为中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中国也从劳动密集型经济体逐渐转变为资本密集型经济体。到2000年,工业制成品与初级产品的比率高达90:10,超过了OECD国家80:20的平均水平。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的低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大大降低,工业产品的出口保持线性增长的趋势,产业结构的调整使我国的贸易竞争力指数不断提高,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竞争优势逐渐显现。第二,出口退税政策转变了出口贸易方式,有力支撑了出口贸易的高速增长。在政策实施初期,由于加工贸易以进料加工为主要模式,税率政策的调整进一步降低了进料加工的相对成本,在替代效应作用下,我国贸易方式开始由低档次一般贸易转变为加工贸易。后来,为了支持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高附加值产品生产,低技术品的出口退税率有所降低,有效抑制了加工贸易产业“来华一日游”的问题,贸易方式转向附加值更高的一般贸易,引导资金向高新技术产业转移,促进了产业升级。

出口信用保险作为保障外汇收入和鼓励对外出口的政策性金融工具,具有事前预警和事后补偿功能,既可以作为调控宏观经济的工具,也可以被视为国际市场的稳定剂和风向标,与出口退税政策一同在国际贸易领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改革开放初期,与外贸相关的保险制度发展十分滞后,因为民营企业普遍不具有外贸经营权,而国营企业受体制约束,普遍缺乏投保积极性。直到1989年,财政部为了鼓励机电产品出口,发展加工贸易,决定在小范围内试行针对机电产品的出口保险,并委托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展相关业务,出口保险制度由此确立。与此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多元化外贸经营主体结构,企业对贸易保险的需求日益上升,2001年成立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为出口贸易的增长提供了更完善的信用保障。2002年中国信用保险金额仅27.5亿美元,到2019年已达到6098亿美元,其中出口信用保险承保金额4988亿美元(见表5),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20%。^②

①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② 数据来源:《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019年度报告》。

表 5 2007—2019 年中国信用保险和出口信用保险情况 单位:亿美元

| 年份 | 中国信用保险及担保金额 | 出口信用保险承保金额 |
|------|-------------|------------|
| 2007 | 396.3 | 335.5 |
| 2008 | 627.5 | 391.1 |
| 2009 | 1166 | 951.8 |
| 2010 | 1964.3 | 1639.9 |
| 2011 | 2538.9 | 2162.4 |
| 2012 | 3256.5 | 2756.6 |
| 2013 | 3969.7 | 3274.4 |
| 2014 | 4456 | 3448 |
| 2015 | 4715.1 | 3856.4 |
| 2016 | 4731.2 | 3975.3 |
| 2017 | 5245.9 | 4366.6 |
| 2018 | 6122.3 | 5049.5 |
| 2019 | 6097.9 | 4988.1 |

资料来源:《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2019 年度报告》。

(五)“走出去”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从“破窗效应”到“蝴蝶效应”

2001 年中国政府提出“走出去”战略,主要形式是通过企业对外投资,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实践是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深化和伟大创举。依托政府支持和引导,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发展迅速,并展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点,即不仅在发展中国家投资,也在发达国家投资。不同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竞争优势是基于中国本土特征而形成的,主要表现为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和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大规模低成本生产、局部技术创新、市场定位能力、市场销售能力以及中国国家的特定优势等。这些中国独有的优势与发达国家主要以工业制成品的技术、品牌、管理、营销等对外投资的传统优势不同,并不能按照垄断优势论、国际生产折衷论等传统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解释的方式复制到对东道国直接投资的过程中,也不符合小规模技术理论、技术地方化理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等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因此,尽管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走出去”战略下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且还改写了以往全球贸易和价值链上发达国家主导对外投资、发展中国家提供资源、接受外资的国际投资史。

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国际贸易范式。首先,“走出去”战略扩大了中国国际贸易市场范围,改变了国际贸易伙伴的地理分布。以往中国的贸易伙伴国集中在东亚、东南亚和美欧地区,地理分布相对集中,且相互贸易量大,使得中国对少数国家的外贸依存度较大,贸易不稳定性较高。“走出去”战略鼓励企业在全中国范围内、依据自身的特定竞争优势而选择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开展对外投资,促使中国对外贸市场多元化发展。2019 年中俄、中拉、中非的贸易额分别为 1107.57 亿美元、3173.7 亿美元和 1068.32 亿美元,^①分别是十年前的 2.90 倍、2.64 倍和 1.17 倍。其次,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型”项目的中欧班列改写了对外贸易严重依赖海运的海洋贸易史。2020 年中欧班列持续保持逆势增长和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全年开行 1.24 万列、发送 113.5 万标准箱,同比分别增长 50% 和 56%。作为亚欧大陆的运输动脉,中欧班列连接

^① 数据来源:WTO 数据库。

了各国工业园区,形成了新的国际生产分工格局。中欧班列的大量开行、站点和海外仓库的建立,促进了中国跨境电商的发展,不仅开创了新陆地运输物流贸易方式,而且改变了以往“投资—生产—贸易”的传统经济合作形式,形成了“运输物流—贸易—生产—运输物流—贸易—生产”的新经济循环形式。再次,“走出去”战略激励企业创新。中国企业“走出去”不可避免面临着更激烈的国际竞争,为降低生产和贸易成本、扩大自身产品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企业必定在生产、运输、质量、服务等方面进行创新,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以培育新的竞争优势,进而通过与国内产业的关联辐射带动国内相关产业链条上的企业进行创新,从总体上使得外贸发展从以数量增长为主转变为以质量和服务增长为主。

四、结论与启示

在中国对外开放的长期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创立了“开放型经济”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和基本观点,深深扎根于中国亿万人民的伟大实践,在批判吸收中西理论文化有益成分的基础上,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市场理论和国际分工理论,为中国经济学界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思想指导,而探索和总结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建立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基石。

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为我们探索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基本规律提供了难得的“自然实验”。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主线是一脉相承的,既包括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实践过程,也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沉淀。在这波澜壮阔的七十多年中,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形成既不是“蛙跳式”跃进,更不是直升飞机式腾空,而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滚雪球”、螺旋式上升的前进模式,这正是中国跨越“比较优势陷阱”、“中心—外围陷阱”的成功经验。劳动力要素、开放合作、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大规模市场与技术创新五种优势在改革开放历史演进中梯度递进、逐级叠加、螺旋上升,在前期优势形成过程中,下一期的优势也在不断孕育,两期优势“齿轮咬合”,多种优势集聚后的乘数效应形成了中国综合竞争优势。当然,竞争优势的形成并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根植于中国持续深化的市场化改革,贸易政策、投资政策与汇率政策制定的连续性和针对性是中国市场化改革成功的重要保障。在国际贸易具体实践中,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就是对国际贸易“硬约束”和“软约束”不断“解绑”的过程,在这其中不断发现新矛盾,依据时空和对象分析并解决矛盾,进而持续增强对外贸易的动力。

如何继续保持中国国际贸易竞争力仍然是今后我们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也是中国继续走向贸易强国的历史性课题。在未来的新发展格局中,如何进一步创新贸易发展方式,运用数字经济的科技成果,构建自主可控安全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和服务链,并在完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开拓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制度性开放新领域,获得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国际金融治理的新机遇,从而把中国开放型经济成功推向 2035 年现代化强国水平,这都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理论创新命题。

参考文献:

1. 贺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自贸区》,《群言》2020 年第 12 期。
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

3. 《毛泽东著作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2 年版。
4. 习近平：《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求是》2019 年第 1 期。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6. Gereffi, G., and Korzeniewicz, M., *Commodity Chains and Global Capitalism*. London: Praeger, 1994.
7. Krugman, P. R., Obstfeld, M., and Melitz, M. 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10th Edition, Pearson, Boston, MA, 2015.
8. Melitz, M. J.,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Econometrica*, Vol. 71, No. 6, 2003, pp. 1695 – 1725.
9. Porter, M. E.,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0.
10. Samuelson, P. A.,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Equalisation of Factor Prices.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58, No. 230, 1948, pp. 163 – 184.
11. Samuelson, P. A., Where Ricardo and Mill Rebut and Confirm Arguments of Mainstream Economists Supporting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18, No. 3, 2004, pp. 135 – 146.
12. Vernon, 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80, No. 2, 1966, pp. 190 – 207.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 & Cooperative Advantag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of the Enduring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PEI Changho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00836)

LIU Bin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100029)

YANG Zhiyuan (University of Anhui Finance and Economics, 233030)

Abstract: Over the past 40 years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has taken advantage of its own strengths to seize the historic opportunity of international transfer of manufacturing production capacity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reconstruction, and has established itself as a major manufacturing and trading country. Even in the face of Black Swan events, such as the COVID – 19, international trade disputes and the wave of de-globalization, the Chinese products still maintain strong resilience and have not fallen into the so-cal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trap”. It is a phenomenon difficult for the mainstream Western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ies to explain, and needs a reflection upon these theories. To do so, we need to turn to Marxist viewpoints on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extract highly generalized logic and basic law from complicated China stories. In other words, the strengths in labor factors, open cooperation, infrastructure, large-scale market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orm a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 & cooperative advantage which is fundamental to the enduring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Chinese products.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s that are highly matched and differentiated in time and space are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an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the formation of China's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 & cooperative advantage. This is a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that comes from China's own practice, not a dogma that interprets and proves Western theories with China as a case study.

Keywords: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 & Cooperative Advantag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nstitutional Reform,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Marxism Theory of Open Economy

JEL: F02, F43, H20